

巨石文化石棚墓

石棚是青铜时期巨石文化的产物，石棚又称“石桌坟”，主要分布于辽南地区和辽东地区。新宾满族自治县亦有大量石棚遗存，主要分布于本县西部和南部，分布面较广。但多在苏子河流域及太子河流域。石棚多建于小山之巅、河畔台地、山坡，依山邻水的向阳平缓之地。石棚大小不一，形制各异，按其规模、形制可分为大石棚、小石棚和地下石棚三种。

小石棚大都分布在辽宁东部山区，成群存在，建于山岗，沿山脊分布，也有建在河畔山前之台地上者。这类石棚规格不一，石室一般长2米，宽1米，高0.7米至1米，盖石长2.5米，宽2米，厚0.3米左右。方向多为东西向，个别为南北向。皆以花岗岩自然石板为料筑成。建筑技术粗劣，四壁组成不够严整。其建筑规模和工艺水平，与大石棚不可比拟。

在新宾，地下石棚较少。地下石棚高矮、大小均与小石棚相似。方向多为东西向，其形制既有别于大石棚，又不同于小石棚，也不与石箱墓相似，它的壁石较薄，有加工痕迹。建筑技术远不及大石棚。石棚建于地下，盖石露出地表。这种石棚似为一种演变过程中的石棚类型。

新宾境内的石棚多分布在苏子河中下游，现存完好的有上夹河镇胜利村石棚，河西村石棚，南沟村河北石棚，古楼村石棚，王家堡村石棚，汤图乡大堡村石棚，石棚村石棚，下营子镇赵家村石棚，木奇镇木奇村石棚，新宾镇北山顶石棚等等。

上夹河镇胜利村的石棚是新宾县境内现存石棚中遗存状况较完好的石棚之一。这座石棚位于村北部边缘，村北为大片平地，稍远则群山连绵，村南有一东西流向的小河，新宾至汤图的公路由东至西穿村而过。石棚存在地俗称“仙人堂”，因一现已不存在的庙宇而得名。

胜利村石棚以三块巨石为足，顶盖稳坐其上，门口有一小石板。石棚坐西面东，南石长 2.3 米，高 0.88 米，厚 0.48 米；盖石长 3.5 米，宽 1.9 米，厚 0.3 至 0.6 米；北石长 2 米，高 0.65 米，厚 0.3 米；西石长 0.8 米，高 0.5 米，厚 0.25 米；门面石长 2 米，高 0.65 米，厚 0.3 米。构筑石棚的石板有的经过加工修凿，有的则取自然石块，而新宾境内的石棚则多由自然石板垒筑而成。

综合石棚研究的大量资料看，石棚是一种古代火化墓葬，这从许多石棚内发现的人骨和随葬品可以证明。我国文献材料中有关火葬的记载说：“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则烟上，谓之登遐，后成为孝子。”“登遐”意为升入天堂，由此可见，古人很早以前就盛行火葬了（此语为列子的话）^①。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都说明火葬是一种灵魂不死的原始信仰，认为肉体的人死后，灵魂要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据辽南石棚遗存考古发现，学者专家们认为巨石文化的石棚是一种火化墓葬。

辽南地区的石棚多有随葬品，新宾的石棚亦发掘出随葬品，但较少。上夹河镇胜利村石棚及河西村石棚，皆发掘出了鼎足器和陶器耳等，并有火烧土层。据此，即可说明早在 3000 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葬式上就已经很讲究了。

那么，石棚究竟是什么时代人类文化的产物呢？关于石棚的建筑年代，我认为是开始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延续到青铜时代，到今约三四千年之历史。出土的随葬品红色夹砂残陶

器、石质五指槽式剑把头、铜饰件、青铜短剑、骨角器、石纺轮、串珠和遍及石板石的多个体的残碎人骨，该属青铜时代的墓葬，多个体经火烧残碎人骨，男性死者的随葬品青铜短剑和女性死者的随葬品石纺轮、串珠同出一墓，反映当时有多个体男女混合埋葬的习俗。

石棚墓为青铜时期活动在辽东地区的古代民族所有的一种葬俗。石棚墓遗存，是民俗学研究和古代民族史研究的宝贵资料。石棚中所葬为何族人？我们只能以东北古民族的分布及其文化特征（考古）等来进行论证。

从先秦到汉魏时期的东北史上，秽、貊与沃沮，同夫余和高句丽一样，同属于秽貊系统的民族集团之一。秽、貊、沃沮和高句丽，由于地域邻近，生活条件相似，同处于东北亚纵深区域的山谷、大川和原泽之中。

秽又作洿。居于松花江流域的洿人，即夫余先世；居于朝鲜半岛北部和东海之滨的为“东夷”、“韩洿”。而以松花江流域的洿人为主体形成为夫余民族。貊又作貉，同洿族一样，是古代“辽东”（含东北南部乃至朝鲜半岛北部）的一支古老部族。貉族以其居住地而分为“大水貉”、“小水貉”，并称的有“梁貉”，即“梁水之貉”。从汉魏时期的中外史籍看，大水、小水和梁水，已被学术界公认。大水，即鸭绿江；小水，即浑江；梁水，即太子河。居于这三条水域的貉族，虽然遭到强大的辽东高句丽的侵逼，但仍袭旧称，世居故地。这说明至少在辽东三河流域，在汉和汉代以前，必为貉部的土著文化区。

从貉族的历史及其文化的分布看，以辽东（古泛指东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为中心的貉族，始见于文献在西周以后。貉族是一支自先秦以来独立发展的北方（燕北）民族集团。据翦伯赞先生考证，包括貉在内的先秦“东夷”，原来主

要居住在山东半岛和环渤海沿岸，是一支殷族分化出来的民族（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 16 页）。山东半岛上的岳石文化为代表的“东夷”，向辽东半岛的迁移和文化传播，当在周以前已经开始。但大量的迁徙，则在周灭商以后，殷人及其周边各族包括貊人大举被迫渡海北迁之时。也就是在这时，殷末遗臣“箕子”携众远避辽东、朝鲜。这与当代考古发现于辽东半岛及其广阔腹地的以大石棚、积石墓和石棺墓为代表的考古文化，其上限集中在商周之际相吻合。由此可知，东北南部的“貊”族应是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并至少在 3000 年前已开始定居东北的土著民族。所以，在先秦文献中，多单称为“貊”、“貊隶”、“蛮貊”、“胡貊”，即东汉郑玄所注“东北夷”。到汉代以后，史书中方合称为“秽貊”。

貊族的分布范围（即其地理位置），大体是以辽东半岛为中心，以辽河为纵线，主要分布于辽河以东的东北南部，环黄、渤海纵深千里，并以鸭绿江、浑江、太子河和浑河流域为中心，含朝鲜半岛北部、长白山和龙岗山脉以南地区。从考古学上则正是以东北南部的大石棚、积石墓和石盖墓、石棺墓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分布区。同时，在春秋、战国之际常常伴有青铜短剑出土。从而证明汉代以后，辽东的大水貊、小水貊和梁貊地区，从先秦以来就是貊族的聚居区，并以大小石棚、石盖墓和积石墓及辽东青铜短剑为其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貊族，郭沫若先生直释为“发即貊也”。从历史地理上看，《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北山戎、发、息慎”之“北发”，也正是古辽东“貊”族的北部。因此说，巨石文化是貊文化。

注：

《考古》，1985 年第 5 期，第 551 页，《辽宁东部地区青铜文化初探》一文。

从东沟石棺墓葬文化 特征看其族种族俗

1989年8月22日，笔者随新宾文物管理部门考察清理了本县大四平镇杨家村东沟石棺墓葬。东沟位于杨家村东座北面南。沟掌上中心偏下有一较大突兀的山包，山包上为大平岗。平岗南、北两端为秃山头，平岗下距沟口约300米。沟口前为一块平地，地西为北太子河上游主流，由东南流向西北，河之南岸即是杨家村落。东沟里两坡及沟掌上平岗已垦为耕田。石棺墓葬即坐落在秃山包上，由偏东南斜向西北，自下而上排列有序，最下的4座墓被当地村民掘挖，由下至上序为1、2、3、4号，我们清理了1号墓。

石棺墓四壁均为数块自然石板立砌而成，上盖有较大的自然板石。墓长1.8米，宽0.6米，深0.7米。墓室中心处呈三角形立有3个陶罐，内装有黑色土。自陶罐处右侧往下依次放有石斧、石刀、石凿各1。墓下石壁外靠左侧立有1个陶罐，内装颗粒状黑土及1颗人的食牙。牙齿根部较长，已被村民粉碎。2号墓中心立有1个陶罐，罐右侧往下依次放有石斧、石刀各1。3号、4号墓中心处各1陶罐，罐右各1石斧。

各墓陶罐形制大小均相同，皆为夹沙灰褐陶，圆唇侈口，溜肩，手感滑腻，手制，多素面，无纹饰，造型较为粗疏，火候低而不匀，有的偏褐，有的偏灰，四壁较薄，泥质较细，含

细沙，表面色泽不均，表里不一，以灰色、灰褐色居多。无耳、平底、鼓腹。复原口径为11厘米，底径7厘米。

石器全为灰白色。石斧长16厘米，刃宽6厘米，肩宽5厘米，体厚3厘米，全部为双斜刃。石器皆灰白色板岩石磨制，石质较为松软，制作精细，表面光滑，但没有实用价值，刃部无砍砸使用痕迹。这是否说明是一种专用的冥器呢？值得注意的是，石刀、石凿等的石质同石斧一样，均为石质松软的灰白板岩石精心制磨而成，制作较易。

石棺墓顶均以较大的自然石板盖压，大石板部分裸露出地表面，上盖有土，长有小树及杂草。有的大盖石板中露或不露，石板大小不等，薄厚不均，周边也不规则，从平面看一般是不规则的正方形、长方形、或者圆形，边长在2米至3米之间，其厚度在30至40厘米左右，需六七个体壮农民方可挪动几厘米，重约1吨余。盖石板的大小与墓室的大小成正比，顶盖石越大，墓室越大，顶盖石越小，则墓室越小。墓地附近没有这种石料的石场，可能来自远处。墓室顶盖石板上不是乱石堆积，而是有多少不均的培土，说明原顶盖石上面都有土堆，经过长期水土流失，石板才裸露出来的。

墓室四壁，均用较薄的自然石板立砌插地而成，大者直径为80厘米，小者仅40~50厘米，多为不大规则的长方形。墓室四角砌筑精细，各边石板插地稳定，牢固地支撑着大盖石板。四壁石板均为灰色花岗岩石，石板自然成形，无打凿加工痕迹。

墓中没有发现人的尸骨，亦未见火烧烟熏遗迹，只在墓外侧左边角的陶罐内遗有人的牙齿1颗。墓中淤满黑黄色沙土，较墓室底部生土色深，与墓室外耕土比色较浅，说明墓室中原来可能葬过人的尸体。

石棺墓群，墓的葬向统一。头（上）向东北20度，从墓

室规则看，都是单人墓。墓底无铺石。随葬品摆放位置有规律，均摆放于生土层之上，与人体置于一个平面上。陶罐均放在墓室中心，1号墓随葬陶罐上2下1，紧密无间，呈鼎立倒三角形。随葬品仅见石器，并皆放在墓室右侧，于陶罐处右侧依次向下有序摆列，刃部皆朝下，距离均等适中，自尸体的右手处至右腿下。4个墓均为东北至西南向，由下之1号至上之4号，东南至西北排列井然。陪葬品无甲兵，说明部落间没有战争，没有军事活动；无网坠，说明无渔业捕捞活动；无石簇，说明没有狩猎活动。仅见石斧、石刀、石凿，说明此古人类从事农耕生产。石棺墓群距部落居住址（平岗上的东山头）约300米，平岗西端的秃山头亦为墓葬区，墓葬区应为该部落的公共墓地。石棺墓无副棺（耳室），亦无附棺，因此，随葬品均放在墓室内的右侧，石器刃部朝下摆放，说明那时的古人类在现实生活中物品专有存放处，生活已井然有序。不同的葬品放置位置不一。石器的石斧、石刀、石凿等生产工具，置于体侧，“放在棺尾部或副棺中，个别放在棺处近旁”，1号墓棺下外左侧的小陶罐，即放在棺尾外近旁。罐内装满了颗粒黑土及1颗人的根部较长的食牙，惜被村民捏得粉碎。罐中的颗粒黑色土（亦已荡然无存，据说，土颗粒一捏便成粉末），可能是葬的谷物种子极可能是炭化了的谷种。1973年，距杨家村西北5公里的北崴子村，曾在一石棺墓中出土一罐遗存完好的谷种，有人将此种种到地里，竟长出与今无异的谷子，只是穗小粒小些而已。东沟1号石棺墓葬人的牙齿，说明古人类已对牙齿有所重视，愿人死后也能有一口好牙。这说明1号墓中葬者为成年人中年岁较长者。

东沟石棺墓中在头部和胸颈之间无任何饰物，并随葬生产工具的磨制石器，说明葬者为男性，因饰物可能佩戴在死者身上，故可发现在头部和胸颈之间；各种生产工具置于死者体

侧，反映了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只有常年终日劳动才能维持生存的情景；各种生活用具不像上两类葬品物紧随死者，当是因这些用具一日只使用数次，并不显得极为重要。

杨家村东沟石棺墓墓葬的方向统一一致，说明石棺墓群可能为一个氏族家族。葬式均为单人葬，头朝山顶，偏东南，正对其居址，脚向山麓，偏西北。从墓室容量看，可能为仰身直肢。墓内无女性陪葬物品，只有石斧、石刀等石器生产工具与陶罐等，属男性陪葬品，故可知墓葬均为男性死者。男性已在生产中居于统治地位，进入了父系氏族制阶段。

陪葬品的组合有一定规律，说明其社会内部两性间的分工已经出现。4座墓葬皆无纺轮陪葬，仅有石器生产工具，这反映了男子主要从事农耕，是获取食物劳动的承担者，故死后的陪葬品主要是农业生产工具；妇女主要从事家务劳动和纺织等，是制作衣服和食物劳动的承担者，故而死后的陪葬品应是一些家务劳动的用具。

东沟石棺墓群已被当地村民于1989年夏盗挖，1991年夏又被盗挖多盗，墓中其他遗物已散毁不详。因小东沟沟口面对的太子河上游主流，在五六十年代河中尚有1~2公斤的鲇鱼、鲢鱼等，故可断定远在3000年前居于河岸边的古人类，肯定应有副以农耕的渔业捕捞生产活动。杨家村群山连绵，谷深林密，野生动物繁衍生息，故而，生存在这一带的古人类应有狩猎活动。农民滥挖盗掘，墓中其他陪葬品，如网坠、石簇等，已难查找，无法考证。

杨家村古人类存在的这种“男耕女织”两性间的分工，男子作战、打猎、捕鱼，主要从事农耕生产，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必要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食物和衣服，做饭、纺织、缝纫。男子是武器、渔猎、农业生产工具的所有者。妇女是家庭用具的所有者，谋取生活资料是男子的事情，而妇女

从事于家务劳动。这种两性间的分工，随着农业、畜牧业和青铜器的出现，家庭中确立了男子的统治地位，妇女成了男子的附属物。男子成了生产领域里的主人。妇女被排斥于社会生产之外，这在人类社会早期的发展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妇女的家务劳动失去了原有公共社会必要劳动的性质，他们的荣誉地位由此丧失，变成了男子泄欲和为其生育后代的工具。

东沟石棺墓陪葬品在数量上存在着差异，虽然不明显，但亦仍可表明这一地区的古人类贫富差别分化已经存在。出现分化的原因，无疑是由于农业生产和家畜饲养的发展，社会财富比前有了较大增长的结果。陪葬品的贫乏，只有少量的石器和陶器，证明这个时期的人类很可能处于奴隶制的早期阶段，约处于父系氏族制的全盛期。

古墓葬是人们在世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反映，是把人们广泛生活境界的事物，缩小到一个墓坑中来体现。所以，我们应当把墓葬看作是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缩影，远古时代劳动人民生活情景的展现，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社会经济形态方面的种种特征，在墓中表现得最具体而又最集中。这种情况，时代越早，代表性越大。因而，在解决社会历史问题方面，墓葬的史料价值尤其重要。

石棺墓葬这种形式，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一种墓葬，距今约 2500 至 3000 年。石棺墓葬几乎遍及抚顺地区及辽东、辽南和吉林省的南部与东部的广大地区，说明其时的古人类生活分布范围之广阔。那么，这时期的古人类究系何种人呢？

据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被称做“九夷”，也称作“东夷”，稍后时期又称做“东北夷”。所谓夷人，是我国古代华夏人对东北各民族的泛称。自夏至周朝，我国东北部地区居住着称夷的民族、部族和氏族，古籍中泛称作“九夷”。晋人郭璞的《尔雅注》称“九夷在东”是根据

前人称夷为东夷而来的。今人杨树达在《论语疏注》中研究认为：“九夷在东北”。《竹书纪年》中记夷有吠（quǎn）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等不同名号。我国古代的夷，除分布在我国东部地区外，还分布在辽宁省。

自汉代以来，我国各民族逐渐形成，民族特征逐渐明显，因此，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被称为东夷，史不绝书。而后人写的《九夷考》则东夷九种为黄、白、玄、赤、蓝、阳、于、方、吠。但是，载入《竹书纪年》的夷人超出了九种，据《论语》疏的考证，九夷又称元菟、乐浪、高丽、满饰、鳧夷、索家、东屠、倭人、天鄙。其中的一些族名到了汉代已变成了地名，如元（玄）菟、乐浪。但却是在我国的东北，大部分地区在我国境内，和我国今天的一些少数民族有渊源关系。

据考证，九夷中的阳夷，分布于今辽西海滨、辽东半岛与朝鲜的西北地区。早在夏商时期，由于华夏人的强大，原居中原的发族移居到了渤海阳夷、于夷居住的渤海海滨。发，又写作毫、番、鄙、彭、蒲、濮，读如 bō。发族约于商代迁到辽东，成为东北夷。发与勃、渤同音，中原人称渤海，即发族人的海，而渤海又有大海的寓意，故改为渤。西周初，发族人继续东迁，经辽东而至吉林南部的辉发河流域，从此，基本上定居了下来，并与中原密切联系。战国以后，发族不再见于历史文献。

夏、商、周三朝，东北地区已分封诸侯。夏朝在东北地区分封商侯，即殷商之先世。商侯的分封地在砥石，即今西喇木伦河与老哈河的发源地。而商、殷也都在东北地区分封竹侯和箕侯。西周初，燕侯封辽西，箕子东封辽东。箕侯集团最初在山东，后来，其中的一支北上进入辽西大凌河上游。殷商初

期，箕侯集团的一个支系逐渐向东迁徙，渡过了辽水，扩散到辽东，并进入朝鲜半岛。据考古专家认定，辽东的青铜文化，是箕族文化（后来演变成秽貊文化）。殷商时期的辽东居民，是箕族，箕族是秽貊之先，后来演变成秽貊。

箕子是殷商末期纣王的大臣，官至父师，是个才能出众的人，他与微子、比干同被称为“殷代三贤”。箕子因劝谏纣王而被监禁。武王灭商后，释放了箕子。箕子是辽西箕族的近支，老家在大凌河上游。周王平定了东方十七国后，箕子不愿当亡国之民，便东渡辽水，到了箕族东迁的地区，建立了国家，都王险城（今辽阳）。后经数世，因受燕国威胁，遂移都平壤（今朝鲜平壤），史称箕氏朝鲜。《旧唐书·高丽传》载：“辽东之地 周为箕子之国 汉家玄菟郡耳。”《新唐书·高丽传》载：“辽东本箕子国。”后至战国末，燕将秦开率军开拓东北，击破东胡，占领辽西，又击箕子朝鲜，“取地二千余里，至满潘汗为界”，其疆域达到今朝鲜半岛的清川江。据考证，周代辽东的文化，是箕氏朝鲜的文化，箕氏朝鲜统辖的居民，有箕族、商族、秽貊，还有燕、齐、赵人。

其后，秽人南移，毗邻辽东；貊人东迁，进入箕族居住之地。貊，又称发，原写作貉，后来变作貊或貉。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又因为时代及居地不同，貊人复有发、毫、白民、白夷、良夷等异称。貊人原为游牧民族，很早就与周王朝建立了联系，并臣服于周王朝。随着华夏势力的不断发展、壮大，一部分貊人被融合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于公元前9世纪末，东迁进入燕北一带。春秋时期退向东北南部，靠近了秽人，并与之毗邻而居，直至汉代始融合为一。

在先秦时期，东北有“北发”屡见于史籍。郭沫若说：“发即貊也。”闻一多说：“发 貊声类同。”孙进己说：“发与貊声近，可能是貊的异称。”据考证，“发”大约在今辽宁省东

北部。”

貊国早在战国时，为燕所灭。《山海经·海内西经》载：“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灭之。”汉水，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今释》认为即辽河，而北貊国就在今东辽河之东北。孙进己、冯永谦考汉水为浑河，貊国之地理方位则更为准确。白民，是先秦时东北的族名，白民可能即夫余之先人，白民之称即由夫余先人衣尚白而来，这样，白民就可能是貊人的一支，亦可能即是阳夷、于夷之后称。高夷，晋孔晁注：“高夷，东北夷高句丽。”今人多据此认为高夷是高句丽的先人。高句丽之名始见于汉代，而高夷早已居住这一带地方，因此，高夷有可能是高句丽先人之名见之于史籍，高夷之居地据此也极可能在今抚顺地区等辽东及吉林东南部地区，而“这高夷也应为貊系的一支”。

据载，在辽东半岛上有两个貊人的小部落，一称周头，一称青丘（《逸周书·王会篇》），两部均为“海东夷名”，“青丘在海东三百里”，这里的海，指今渤海，两部之地均在辽东半岛之上，可能以狩猎兼畜牧为生。而“貊国”在汉水（今东辽河或浑河）上游的东北。辽河中游为梁貊等部，再东，即为貊人的白夷部，又称白民，白亦即貊，白夷部当在长白山以南的鸭绿江流域。而最东部的貊人为朝鲜半岛上的“良夷”，即“乐浪之夷”，汉代设乐浪郡于良夷地区。

据专家考证，秽貊可能由箕族演变而成。箕子东走带走5 000余民和大批箕族殷民东迁，使辽西、辽东、朝鲜半岛的语言形成同一方言区。由于箕子东走，把殷人尚有的习俗传了去。殷人尚白，辽东和朝鲜半岛的秽貊也尚白；而早于秽貊文化的殷墟妇好墓玉人着短衣裙，这反映了商代文化，通过箕子传到了东方，因而，秽貊的妇女亦着短衣裙。

专家考证认为，居于今辽东地区传说中“九夷”之一的土

著人类“满饰”（亦即“满节”）人，被发族所融合，而发族又被箕族所融合，箕族为貊人之先。因此，秦汉时期的“满番”这一地名，即是秦以前满番人居住的地方，以族名称地名。而“满番”，即秦以前来自中原的发人、箕人与今辽东鸭绿江流域的远古土著居民满饰人相结合而形成的满番族。春秋战国时期朝鲜北部的“满潘汗”与明代朝鲜北部的“满浦”地名，即是从古代“满番”演变而来的。建州女真人进入今辽东，并定居辽东广阔地区以后，“这个地区居住的土著居民多是满饰族的后裔。”因此，专家考证认为：“建州女真的后期活动的地区正是古代满饰人民住的地方”，这后来成为清太宗皇太极确定满洲族名的依据之一。

综上所述，早在西周前，居住在今辽东的古人类应是满饰夷人，发族和箕族东迁后，部分满饰人融合于发族、箕族中，后来，又演变成貊族，而石棺墓正是发族、箕族及早期貊族人的墓葬习俗。

清流秀水太子河

太子河，水流湍急，清澈秀美。其北太子河发源于新宾平顶山镇的红雁、罗圈沟、杉木厂，大四平的东干沟。据《奉天通志》载：“北太子河源出兴京县治西南九十五里二道荒岭，俗以本河为太子河正源，更以源出杉木厂者为本河之正源者误也。西北流经老岭沟南，又西经罗圈岭南，又屈西南经平顶山村南迤西左会桓仁县西北境老岭水（老岭，即今新宾县大四平之东干沟岭，为草帽顶山之岭）。又折西北经大哪咩村南，右受大北沟水。又西流经偏砬河村北，右受偏砬河。又西北屈折西南而西，经老虎洞村南，右受通沟河。又屈西南，经太子城村北，左受夹河。……又西流经下夹河村南迤西，计行兴京境内流长一百二十二里。又西流出兴京界入本溪境”^①。太子河源出新宾县，流经平顶山、苇子峪、大四平、草盆、下夹河等乡镇，自下夹河乡的两岭子西流入本溪县境。太子河是新宾三大水系之一。世世代代生活在太子河流域的人们，你们可曾知道太子河悲壮的历史及其名字演变的由来吗？

公元前 11 世纪，西周王朝建立后，辽宁是西周分封的燕侯国的辖地。战国时代的北方燕国，欲图国力发展，只有先消除东胡族的侵扰，然后才能摆脱被动的困境。至燕昭王时，燕国名将秦开统率大军对东北方的东胡等民族进行了突然袭击，迫使东胡族向北退却了 1 000 多公里。燕国趁机“筑长城，置五郡”，进一步强化了对辽宁地区的统治。由于燕昭王治国有方，

使燕国由弱变强，疆域从河北扩展到了鸭绿江，成为战国七雄中举足轻重的大国。根据考古实地调查，燕在辽宁所筑长城，由建平向东，经北票、阜新等地，转而到襄平（今辽阳市），全长1000余公里。在长城所经过的地区，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个郡，而右北平、辽西、辽东三个郡全部或部分地在今辽宁。

燕在辽宁境内兴建长城，设郡治，既维护辽河流域农业区的社会安定，又促进了生产技术和推广，开发了大批荒野为农田，使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各种手工业生产技术也有长足进步。

到了战国末年，辽宁已成为燕国抗拒强秦的战略要地。至燕王喜时代，燕国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秦灭六国的统一战争中，燕国为了抵抗强秦的进攻，燕王喜与韩、赵、魏、楚等国联合抗秦，燕太子丹还设计发动了“荆轲刺秦王”事件。公元前226年，秦王（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在消灭了齐国后，挥戈北上，兵临易水（今河北省易县境内），直逼燕都（即蓟州，今河北省蓟县）。这时，燕太子丹决心孤注一掷，派遣游侠荆轲带勇士秦舞阳和涂着毒药的匕首，以献地图为名，赴秦刺杀秦王，以图挽救国家。太子丹送荆轲到易水河畔，荆轲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便登车西去。在咸阳殿上，荆轲献上燕国督亢地图给秦王看，结果“图穷匕首见”（见发现音，现意），荆轲抓起匕首刺秦王未成，反被秦王连砍八剑，倚殿柱斥秦王而死。

这一计策的失败，不仅未能阻挡秦的攻势，反使秦王大怒，立即派大将王翦急兵攻燕，燕国太子丹虽殊死抵抗，仍被秦军打得大败。第二年（前225年）十月，秦军攻陷了燕国都城蓟州城后，燕王喜及太子丹率领精兵退保辽东郡的首府襄平（今辽阳市）。秦王更派大将李信率大军打到辽东。这时，秦军

声言，如果能把太子丹的首级献给秦王，秦王定必保住燕国家。燕迁都襄平后，太子丹看到秦国势力日盛，而自己的燕国渐渐衰弱，只好退居于流经襄平的衍水之上，积蓄力量，筹划准备抗秦的大计。

然而，昏庸无能的燕王喜，见秦军紧追不放，又急又怕，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竟然轻信了秦军的计策，派人于衍水岸边诱出太子丹，残忍地杀害了。结果，秦军仍是攻燕不止。最后，燕王喜也成了秦军的俘虏。后人为了纪念这位爱国忧民的太子，就把他居住过的衍水改名为太子河。

太子河，战国时代叫衍水，汉魏时代叫大梁水或梁水，辽金时代继续称梁水或东梁水，辽代末年方改称太子河，“明代或名代子河”^②。《地名志》载：“相传，燕太子丹逃匿衍水筑城得名”。《方輿纪要》云：“太子河即古衍水。燕太子丹匿于衍水岸边，后人因名为太子河。”今新宾下夹河乡政府所在地南1公里的山岗上，有一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太子城”遗址，南通公路，东、北、西三面为悬崖陡壁，北壁下为太子河。古城东北西三面城墙完好，内城、外城址豁然醒目。据传，此即为燕太子丹驻居之城。考古工作者多次挖掘，出土了大量历代文物，远至新石器时期，近至清代，可见此“太子城”的历史久远。另据《清一统志》载，清乾隆时高宗巡幸兴京，途经此河，“指太子河为国语（满语）塔思哈河”。塔思哈为满语，意为虎。因音相近，讹为太子，后人不察，遂附会为太子之事。这种说法不足为信。满人据辽左，是在明代，而太子河名早在辽代即有，相距700余年，此说为妄。

注：

《奉天通志》卷70，第1565页。

《奉天通志》卷70，第1564页。

肃慎族地非辽东

东北地区在历史上基本是四大民族系活动的场所，一个是汉族系，一个是东胡系，一个是肃慎系，一个是秽貊系。对各大族系活动中心地区的争论数肃慎族系较大。争论虽大，亦未出白山黑水的广大地区。近年来，有人提出辽东周朝时亦为肃慎族系活动地区，甚至山东、河北两省的部分地区，也是肃慎族系的活动地区，说辽东诸山脉联长白，肃慎人依山作寨，聚之所亲居之，以狩猎为业^①。也有人说，辽东久已开发，商、周时肃慎人在此地居住，耕田狩猎，采果捕鱼^②。肃慎以采猎为生，不事农耕，历史文献早有记载。这里所说的“辽东”，如指辽东都司辖地而言，则其辖地区域南起旅顺口，北至开原，东临鸭绿江，西至山海关^③。它“南望青徐，北引松漠，东控海西女直”^④，是中原地区北连奴尔干辖区的中间环节，犹如一条巨大的臂膀，横亘在明廷京师的左侧，构成了一道政治、军事的天然屏障。周代以前的辽东地区生活的人类究竟为何种族、为何种族系的活动地区？这涉及辽东种族及东北四个古代主体民族（系）的分布问题，更涉及辽东人口的种族、渊源、演变、进化问题。因此，不能不弄清楚。

在论述肃慎族地之前，应先弄清“东北”和“辽东”的含义。最早著录“东北”和“辽东”的古文献有《尚书》、《周礼》和《管子》等。《尚书·禹贡》篇里说东北曰幽州，并说山医巫闾。《周礼·职方氏》亦曰，东北曰幽州，其山镇